

中国 全史

名誉主编：张岱年 季羨林
主 编：史仲文 胡晓林

中国魏晋南北朝宗教史

杨耀坤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的新奉献

百卷本

中国全史



A0571182

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丽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全史(全一百册)

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4.4

(百卷本《中国全史》丛书/史仲文，胡晓林主编)

ISBN 7-01-001757-3

I. 中

II. ①史②胡

III. 通史-中国

IV. K2

中国全史(全一百册)

ZHONGGUO QUANSHI

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93 插页400

字数：15500千字 印数：1—400册

定价：980.00元

一、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，主要有道教和佛教。

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，形成于东汉后期。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，张鲁在汉中、巴蜀传播的天师道仍在传播。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，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系统，张鲁在汉中就以五斗米道组织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。建安中，曹操夺取汉中，将张鲁及其部分教民北迁，天师道因而在北方传播。但张鲁到北方后不久即去世，天师道因而组织涣散。在巴蜀的天师道也因无领导组织同样涣散。

成汉李氏据蜀后，因其信奉天师道，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。

魏晋间北方战乱频繁，灾荒不断，人民群众便流入江南或巴蜀，而巴蜀民众也因此又流入江南。于是北方的太平道和巴蜀的五斗米道也传到江南。江南就出现了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、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、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。这些道派都广泛在民间传播，后来还多次出现李弘起义与孙恩、卢循起义。

传入江南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的同时，也不断向上层发展。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的士族就明显增多，如琅邪王氏、高平郗氏、吴郡杜氏、义兴周氏等等，都有信奉天师道的。

东晋初，葛洪对以前的神仙思想作了总结，确立了神仙道教

理论体系,并发展了金丹派的炼丹术。葛洪认为,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,成为神仙,而修道最主要的方法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。故葛洪特重炼丹,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化学资料。葛洪的著作很多,现存而又最重要的是《抱朴子》。

东晋中叶以后,江南天师道盛行,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,《上清经》和《灵宝经》就是其中的两类。《上清经》是杨羲、许谧所造,以后便发展为上清派。《灵宝经》是葛巢甫所造,以后发展为灵宝派。

南朝初期,陆修静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,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;并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,分类整理了道教典籍,为道教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。

南朝中期的陶弘景,在隐居茅山的45年中,广招徒众,弘传上清经法,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,后世因称之为茅山宗。陶弘景除弘传上清经法外,还建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,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。陶弘景的著作很多,方面也广,主要的有《真诰》、《登真隐诀》、《养生延命录》等等。

北魏太武帝时,寇谦之对天师道作了改革,改革的原理是“以礼度为首”,即以封建礼法制度为准则,凡符合的就保留和增加,不符合的就革除。经此改革后,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,成为了统治者所用的官方道教。但是,北魏道教的发展终不如佛教,加之寇谦之之后又没有杰出的弘教者,新天师道便在魏末衰落了。北齐甚至不承认道教,北方道教只有北周关中地区兴起的楼观道在发展,并成了后世隋唐最兴盛的道派。

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,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,终东汉一代,没有得到大的发展。及至汉末,由于战乱迭起,广大群众备受摧残,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。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,由

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,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,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。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《理惑论》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。

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,至其中期,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,节译了戒律一卷,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。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,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,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,大讲《般若经》。而当时《般若经》的翻译还很有限,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。

孙吴时期,有祖籍西域的支谦、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(今江苏南京),译出了大批佛经。

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,但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,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,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。

西晋时期,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,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《放光般若经》后,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,很多僧侣、士人都纷纷宣讲、传诵此经。

西晋的佛经翻译,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。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,至西晋末,共译佛经84部188卷。这些译经范围广泛,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,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,上自王公贵族,下至平民百姓,以至边地少数民族,都有信奉佛教的。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。

东晋十六国时期,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。在北方十六国中,尤以后赵、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。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

民族，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，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。后赵石虎就曾说：“朕出自边戎，……佛是戎神，所应兼奉，”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，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、石虎深深崇信。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，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。

前秦苻坚崇信佛教，在夺取东晋襄阳后，迎得高僧道安。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，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。至苻秦都城长安后，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。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，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。他对《般若经》特别重视，坚持每年宣讲两遍，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，撰成《合放光光赞随略解》等一系列著作。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，整理撰写了《综理众经目录》。道安在长安的最大一项佛事活动是组织译经。他在长安整6年中，直接主持译出佛经14部183卷。道安在组织译经中，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，提出“五失本”弊病和“三不易”作到的准则，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，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
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教学者，更是弘传佛教的大师。他徒众甚多，并主张“教化之体，宜令广布”，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，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，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，在他即位后，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，竟派兵西伐后凉。鸠摩罗什至长安后，姚兴即“待以国师之礼，甚见优宠”。

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。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，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年中，译出大量佛经（包括新译和重译），经现代学者判定，现存尚有39部313卷。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，对后世影响较大。其中尤以《般若经》和“四论”（《大

智度论》、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影响最大。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,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。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,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,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。

鸠摩罗什还带了不少弟子,其中参加译经最得力者有道融、僧晔、僧睿、僧肇等等。僧肇还著有《般若无知论》等四论,后人收集成册,称为《肇论》。《肇论》以般若为中心,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,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,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,管理全国僧众,正职称僧主(即僧正),副职称悦众。在此稍前,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,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,可能都是各自设置,没有相互影响。

北凉之佛教,以天竺僧昙无讖至凉州后最盛。昙无讖在凉州翻译了《大般涅槃经》、《方等大集经》等11部117卷。其中《大般涅槃经》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,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。

东晋时期,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,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;加之皇权衰弱,士族势盛,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,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。如高僧竺道潜、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。

东晋信奉佛教的士族名士还有撰写佛教著述的,如郗超撰写了《奉法要》、《明感论》、《全生论》等等,孙绰撰写了《道贤论》、《喻道论》等。

在东晋十六国时期,由于佛教的般若学依附于玄学,便出现了讲解佛经用玄学典籍的概念去比配佛学“事数”概念的“格义”现象,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。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,便出现了般若学“六家七宗”的不

同派别。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,发展到后世,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。

东晋后期,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。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,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,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。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,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,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,影不出山,迹不入俗,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,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,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慧远是成绩卓著的佛教学者和弘传大师。他撰写了不少著述,《高僧传》说他“所著论、序、铭、赞、诗、书,集为十卷五十余篇”。他的佛教思想也是多方面的,其主要方面有法性论、形尽神不灭论、因果报应论、弥陀净土信仰、念佛三昧的禅学思想、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佛儒调和论等。在弘扬佛学方面,慧远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《三论》,使大乘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,对隋唐三论宗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。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,对后世净土宗、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东晋后期,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;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。法显自后秦弘始元年(公元399年)从长安出发,西度沙漠,越过葱岭,到了天竺各国。于东晋义熙八年(公元412年)回到青州长广郡,次年才到达建康,前后历时15年,带回了《大般泥洹经》、《摩诃僧祇律》等11部经律,并在建康翻译出大部分。这些经律都是深合当时需要的,《泥洹经》译出后,就引起了佛教界的变化。法显回国后撰著的《佛国记》,对西域、中亚、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、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,是研究五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。

南朝帝王崇信佛教的甚多,其中以宋文帝、梁武帝和齐竟陵

王萧子良最为典型。宋文帝既崇重佛教,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。他认为:“率土之滨皆纯此化(佛教),则吾坐致太平,夫复何事!”南齐竟陵王萧子良,于齐武帝时开西邸,即广招名僧讲说佛法,又举办斋仪,抄传佛经,撰写劝善文等。

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,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,就下《舍事道法诏》,正式皈依佛教。此后,梁武帝就大力提倡佛教,通过一系列措施,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。其措施主要有:敬重僧侣、建寺造像、举办法会、布施舍身、禁断酒肉、讲经注经及著述等等。在现存梁武帝的著作中,还反映了他三教同源与神明成佛的佛教思想。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,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。

在佛教理论的研讨与宣扬方面,晋末宋初起了变化,已从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。在这一转变中,竺道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当法显译出6卷本《泥洹经》后,道生根据其中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之说,提出“一阐提人”(断灭善根的恶人)也有佛性皆得成佛说,立即遭到守旧派僧侣的反对,道生也因此被开除僧团。后来凉州昙无讫译的40卷本《大般涅槃经》传到建康,经中果有“一阐提人”皆有佛性的说法,道生之说才被公认。自此,涅槃佛性说便广为传播。

竺道生还撰写了《二谛论》、《佛性当有论》、《维摩经义疏》等著作,但他影响最大的学说还是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,这两种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南朝除盛行涅槃学外,还盛行《成实论》与《三论》学。南方《成实论》的传播,始于宋初至寿春的僧导。僧导弟子甚多,以《成实论》知名者有道猛、僧因、昙济等等。齐梁二代《成实论》学也相当盛行,齐代的僧柔、僧次,梁代的僧旻、法云、智藏,都是弘传《成实论》的大师。

南方《三论》学之兴盛较晚,梁武帝时辽东僧朗居于建康北面的摄山,弘传《三论》,后来因称为“摄山三论”,僧朗也被称为摄岭师。梁武帝曾遣智寂等十师前往受业。僧朗的弟子以僧诠最著名。僧诠的弟子又以法朗、智辨、慧勇、慧布四人最有名,时称为“四友”或“四公”。至陈代,慧勇于陈文帝天嘉中被请于太极殿讲经,自此声名大振。慧布仍在摄山,也受到陈代诸王之礼敬。法朗更为突出,于陈武帝永定初奉敕入京住皇兴寺,常讲《华严》、《大品》诸经及《三论》。弟子甚众,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。隋唐时的吉藏就是其中之一。

南方之禅学不发达,至陈代中期,北方禅师慧思南下,进住南岳,弘传禅法,信众云集,南方禅学始盛。

南方弘传的律学是《十诵律》,律学家以刘宋的智称及齐梁的僧祐最著名。

南朝之译经,以宋代及梁陈之际所译最为可观。刘宋之译经,以天竺僧求那跋陀罗所译最多,译出 77 部 116 卷。其中有影响较大的《杂阿含经》与《楞伽经》等。梁陈之际的译经,以天竺僧真谛所译为主。真谛于梁武帝太清二年(公元 548 年)入建康,正准备译经,侯景就进攻建康。后便颠沛流离于东南各地,但真谛并未停止译经和讲经,至陈宣帝太建初,共译佛典 26 部 87 卷。真谛所译经论,以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为主,如《摄大乘论》、《阿毗达磨俱舍释论》等等。真谛译经边译边讲,其弟子记录下来便成义疏,这就是真谛的著作,数量也不少。

真谛所传瑜伽行派学说,在当时影响还不大。至真谛去世后,其弟子返还各地传播《摄论》学。《摄论》学遂遍及南北各地,与北方《地论》学并驾齐驱。

南朝除译经外,还有不少中国学者的佛教著述,但大多已散

失。现存而又重要的,有梁释僧祐的《出三藏记集》与《弘明集》、释宝唱的《比丘尼传》、释慧皎的《高僧传》等。

南朝的佛寺梁代最多,有 2846 所,仅建康就有 500 余所。南朝的僧官制度已比较完善。中央设有僧局或僧省,长官称僧正,副职称都维那或僧正悦众。地方州、郡、县也设置僧正,而副职仅州有时设置。

南朝的儒释道之争比较激烈,尤其是神灭与神不灭之争,争论的时间最长,参加的人数最多。这一争论在东晋时即已开始,刘宋初何承天、宗炳等人又反复争论。至齐梁时由范缜把争论推到了高峰。范缜撰写了《神灭论》,主张形尽神灭,而萧子良、梁武帝及其臣下 60 余人都先后攻击范缜之说。最后虽然范缜之说有理,而梁武帝却用权势压制,使争论不了了之。此外,还有夷夏之争与“三破”之争,都是道家和儒家针对佛教的,但争论不激烈。从总的趋势看,南朝时期虽有儒释道三教之争,但主张三教一致的还是占主导地位。

北朝诸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灭佛外,都不同程度的崇信佛教。魏太武帝之灭佛,与信奉天师道的崔浩的关系很大。其灭佛手段也相当残暴。但灭佛不久太武帝就去世,佛教又得到复兴。周武帝之灭佛比较温和谨慎,在灭佛前,就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,然后宣布废除佛道二教,僧尼、道士还俗为民,并无杀戮措施。

北朝也有排斥佛教的儒士,如阳固、裴延偶、李瑒、张普惠、杨衒之、刘昼、章仇子陀等。

北朝佛教,义学不发达,故译经也少。魏宣武帝永平初,才有天竺僧菩提流支等到洛阳译经。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至东魏天平间的 20 多年中,共译佛典 39 部 127 卷。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

还有天竺僧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等。在他们的译经中,以《十地经论》的影响最大。《十地经论》译出后,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就分别传授弟子。大概二人对经论的理解不同,说法就有分歧,后来便形成两大派系。菩提流支传授的有道宠,称为北道系;勒那摩提传授的有慧光,称为南道系。因南道系在魏末及齐周隋三朝中担任僧官的人多,故影响最大,实力最强。北朝除盛行《地论》外,还盛行《阿毗昙》。弘传此学者是慧嵩,世人称之为“毗昙孔子”。

北朝盛行禅法,因北朝统治者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。建寺造像开石窟就是修功德;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。

北魏影响最大的禅师是天竺的佛陀禅师,于孝文帝时来到北魏。孝文帝为他在嵩山建了少林寺。他的再传弟子僧稠最有名,魏孝明帝曾三次召之入京。北齐时,僧稠也受到文宣帝极高的礼遇,使佛陀一系之禅学盛传于北齐。

达摩禅师在北魏也传授禅法,因未得到统治者重视,影响不如佛陀大。但在民间还是有较大的影响,故后世禅宗史还尊达摩为初祖。

北朝传播的律有《僧祇律》、《十诵律》与《四分律》,后来却以《四分律》为主。弘传《四分律》的以慧光影响最大。慧光撰有《四分律疏》,至唐初仍为僧众所重视。

北朝还盛行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。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净土信仰。弥勒信仰的盛行,可从各种造像中弥勒造像占了很大比例看出。弥陀信仰则由北魏后期的昙鸾所倡导。他受到魏朝廷的崇敬,称之为“神鸾”。他又撰有《往生论注》、《赞阿弥陀佛偈》等著作,对当时和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,后世净土宗就尊昙鸾为初祖。北朝观世音信仰的盛行,也可从各种造像中观世音造像之多看出。特别在北魏分裂后,观世音造像剧增以及

《高王觀世音》的出現，說明魏末以後觀世音信仰更加盛行。

北魏建寺甚多，魏末佛寺已達 3 萬餘所，僧尼 200 萬眾。如此眾多的寺院和僧尼，除極少數大寺由國家或權貴供給外，絕大多數寺院主要靠擁有的土地資給。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圖戶或避役出家的下層僧侶耕種。佛圖戶又稱寺戶，是魏獻文帝時由沙門統曇曜奏請朝廷設置的，由罪犯和官奴組成，隸屬於寺院。他們除為寺院洒掃勞動外，還要耕種土地向寺院輸粟，實為寺院的農奴。北魏除佛圖戶外，還有僧祇戶。僧祇戶是每年向州郡僧曹繳 60 斛僧祇粟的民戶（主要是平齊戶）。這是僧曹的一大筆收入。

北朝僧官設置較早，魏道武帝皇始中就開始設置，稱為道人統。文成帝時改名沙門統，又稱為沙門都統。其副職稱都維那，始設於孝文帝時。州郡也設有沙門統和都維那，而縣只設維那。寺院則由上座、寺主、維那管理。

中央的僧官機構，北魏初稱監福曹，後改稱昭玄寺。州郡縣的機構則稱沙門曹。

北朝鑿建石窟多處，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，是北魏開鑿的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。

二、汉末魏晋时期道教的传播与分化

（一）巴蜀汉中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北迁

五斗米道是张陵于熹平二年（公元 173 年）三月一日在蜀中创立的，本自称“天师道”，又因张陵著有《正一经》，后世道教徒又称之为“正一道”。当时入道之人须缴五斗米，世俗遂称之为五斗米道。张陵死后传其子张衡，张衡又传其子张鲁。故后世道教徒称张陵为天师，张衡为嗣师，张鲁为系师。世又称之为“三张”。但五斗米道在张陵、张衡时并不盛行，至张鲁时才兴旺发展起来。

张鲁字公祺，“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。鲁母有少容，往来焉家。初平中（公元 190—193 年），以鲁为督义司马”。^①又有巴郡（治今四川重庆）人张修也在巴郡、汉中传授五斗米道，刘焉又以之为别部司马，命二人往击汉中太守苏固。至汉中后，张鲁遣张修攻杀苏固，后张鲁又杀张修，因据有汉中。当时汉朝廷无力过问，便以张鲁为镇民中郎将，领汉宁太守。张鲁便在汉中大传五斗米道。

^① 《华阳国志》卷 2《汉中志》。

张鲁采取政教合一的方式。初来学道的人称为“鬼卒”，上面则设有“祭酒”和“治头大祭酒”统管教民与群众，最高的教主与统治者称“师君”，由张鲁自己担任。其统治注重教化，要求诚信不欺诈；如果犯了法，则经再三宽恕，然后才行刑。生病的人，令自首其过。张鲁还在其境内创立义舍，设置义米肉，“行路者量腹取足；若过多，鬼道则病之”；又“不置长吏，皆以祭酒为治，民夷便乐之”。^①

五斗米道以《老子五千文》为主要经典，信徒都要诵习，但《老子》是哲学著作，故祭酒在讲解《五千文》时，就须改造附会。据唐初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序录》，可以推断《想尔注》即张鲁所撰。张鲁五斗米道的理论思想，就集中表现在讲解改造《老子》的《想尔注》中。在宗教思想方面，《想尔注》首先神化老子的“道”，说“道至尊，微而隐，无状貌形象也；但可从其诚，不可见知也”；又说“一者道也，……一散形为气，聚形为太上老君，常治昆仑”。“道”便成了最尊贵而必须服从的无形象的自然神与有形象的人格神。其次，宣扬长生成仙说。说“归志于道，唯愿长生”，“欲求仙寿天福，要在信道”。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，《想尔注》提倡仁义忠孝，说“上古道用时，以人为名皆行仁义”，“道用时，家家孝慈”，“道用时，臣忠子孝，国则易治”。^②《想尔注》还与《太平经》有不少相同之处，如二者都强调奉道诚、炼养，主张积善成功、积精成神，以致太平，以致仙寿，等等。

本来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，统治者对太平道是严厉打击禁止的，建安中曹操就连方士也集中控制起来。曹植《辨道论》说：“世有方士，吾王悉所招致，……集之于魏国者，诚

① 《三国志》卷8《张鲁传》。所谓“民夷”，民指汉民，夷指賁人等少数民族。

② 以上均引自饶宗颐《老子想尔注校笺》。

恐斯人之徒，接奸宄以欺众，行妖慝以惑民。”^①对汉中的张鲁只是无力过问而已。至建安十三年，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后，形成了三方政权鼎立的局面。曹操再也不可能吞并江东的孙权与巴蜀的刘备，便着手巩固内部，并夺取与关中紧密相连的汉中，遂于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出兵汉中。张鲁很快投降。曹操为了安抚张鲁，便以之为镇南将军，封阆中侯，又封其五子及其臣僚阎圃、李休等为列侯。^②接着曹操将张鲁及其部属以及汉中民数万家迁往北方。^③五斗米道也因之北上。本来曹操对张鲁等的迁徙有分散控制的意图，但因张鲁等人诚心臣服曹操政权，曹操也就不在禁止五斗米道在北方传播。

（二）天师道在北方的传播

曹操虽未禁止北迁的天师道，但因其离开了故地，原有的组织体系被拆散，祭酒信徒分散到了各地，势力也就大减。加之魏文帝曹丕代汉后，对道教和淫祀巫祝控制禁止较严，天师道的传播必然受到影响。黄初三年（公元222年）曹丕诏说：“告豫州刺史，老聃贤人，未宜先孔子。……汉桓帝不师圣法，正以嬖臣而事老子，欲以求福，良足笑也。此祠之兴由桓帝。……恐小人谓此为神，妄往祷祠，违犯常禁。宜宣告吏民，咸使知闻。”^④这明确指

① 《三国志》卷29《华佗传》裴注引。

② 见《三国志》卷8《张鲁传》。

③ 张鲁之北迁，无明文记载。《真诰》卷4注：“张系师为镇南将军，建安二十一年亡，葬郾东。”郾在北方，据《三国志》卷15《张既传》载：“鲁降，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。”同书卷23《杜袭传》载：“袭领丞相长史，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。太祖还，拜袭骠马都尉，留督汉中军事。绥怀开导，百姓自乐出徙洛、郾者，八万余口。”由此推断，张鲁于建安二十年迁至郾后，次年就卒于郾。

④ 《续高僧传》卷23《释僧勰传》。